



拜客·广州：不可能的事就这样做到了/今天，我的一次公民行动/“中国模式”谁敢接受/NGO搅动着哥本哈根/美国：84%的捐款来自个人/记恋真由美/把社会新闻大声读出来/律师学者建言：公办幼儿园应平等接收新市民儿童/香港有个投诉合唱团/麻风康复者眼中的世界/公益购物，爱心无限大

@民間

行动改变生存

2010年 第九期



@民間

第九期/2010年

在线阅读/下载: atminjian.ngocn.org

博客: zaimianjian.ngocn.org

联系邮箱: zaiminjian@gmail.com

编者的话

韩寒最近在厦门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们当时容忍了“绿霸·花季护航”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绿霸·花甲护航”。

所以，当假借保护我们的名义实则侵犯我们利益的事情出现时，我们是可以做些什么的，就像田奇庄2010年1月25日的公民行动，他带着八百多市民签名的《改革公用企业涨价听证会》意见书前往邯郸市人大代表报名地点，并尽可能交给更多的代表。他发现，水、电、煤气等公用企业只要想涨价总能成功，而公众所看到的听证会其实只是虚晃一枪。他想以公众的名义促使人大代表将此事作为议案提交人大会议。

一帮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想要“送一辆自行车给广州市长”，希望引起政府重视以改善城市自行车环境及尊重骑车人的平等的道路使用权。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但没想到几个月后，一辆广州本地五羊牌自行车居然真的送到了市长手上，市长表示要认真考虑“拜客”（bike）们意见。这个故事说的不仅是行动力，也有很好的方法分享，公益，也是需要创意的。

这些年常会听到“中国模式”这个词，它让很多人充满了自豪，尤其在看到这个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昂首挺立的样子。可是看一看中国为了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这样的

《“中国模式”谁敢接过来……收》。

在美国，84%的捐款来自个人。捐款不在公司、学校、政府机关中进行，更没有组织动员的。这次为海地捐款的一种很受欢迎的形式是“手机短讯”。“普通公民参与公益，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社会风气和公民行为的相互补充关系。”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NGO们的各种“show”几乎充斥着媒体的报道，虽然他们的努力对里边的谈判几乎不起作用，但NGO仍然搅动着哥本哈根。虽说气候变化是个筐，但筐里总得有实打实的东西。NGO在热闹背后的努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我们的梦想就像北方的春天，虽然迟来，但你能幸福地看见，草坡从远处一点一点绿了



目录

民间报告——焦点 3

拜客·广州：不可能的事就这样做到了（陈志君）
今天，我的一次公民行动（田奇庄）

公民之声——观点 23

“中国模式”谁敢接受（丁学良）

全球公共生活——接点 29

NGO搅动着哥本哈根（窦丽丽）
美国：84%的捐款来自个人（徐贲）

思考与感悟——茫点 44

记恋真由美（郭宇宽）

野花烂漫——彩点 48

把社会新闻大声读出来
律师学者建言：公办幼儿园应平等接收新市民儿童
香港有个投诉合唱团
麻风康复者眼中的世界
公益购物，爱心无限大

推荐 57

《史怀泽传》 钟肇政 编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们台湾这些年》 廖信忠著 重庆出版社
《平民信孚 一部民办教育的传奇范本》
张立勤著 作家出版社
《常识》 梁文道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者按:

一群热爱广州、希望城市变得更贴心的年轻人组成了一个拜客·广州小组，拜客是英文bike的谐音。他们要送一辆自行车给广州市长，希望市长听取市民意见，让城市给自行车多留出一些位置来。几个月后，他们竟然做到了，一辆广州本地五羊牌自行车送到市长张广宁手中，并针对广州自行车生存现状向政府提出了六条建议。

这一事件立刻引起广泛关注，媒体接二连三地报道，包括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它让自行车这一话题得到空前关注，从生活方式、城市环境改善引申到骑车人在城市交通设施中的平等权利。于此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广州年轻人的行动力和行动背后的创造精神。

拜客·广州： 不可能的事就这样做到了

文 / 龙镇

“拜客·广州”和张广宁市长会面，最初的设想，是找个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在市政府门口约见市长，说明诉求，送上单车，合影留念，就完事了。我们甚至想，这十五分钟就安

排在早上上班前，或者下班后，不占用市长正常办公时间，这样见面的机会也大些。

事实上，1月12日下午五点整，张市长领着市政府秘书长、市城乡建委主任、市环保局



拜客·广州

局长、市交委副主任、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主任一众官员，在市政府东厅和我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面，谈了市政府在广州交通规划方面的想法，谈了政府和民间应该多些互动，对我们提出的六点建议一一作了详细答复，并安排交委牵头、其他相关部门配合落实。中途也安排市规划局总工程师向大家介绍珠三角绿道规划，以及交待交委接下

来继续和我们保持沟通。市长还接受了我们的邀请，答应在适当时候和志愿者、市民们一起骑车出游。

有媒体后来称，这次的会面，市政府是有备而来，借这个机会做了一把宣传。

但不管怎样，“拜客·广州”的中期目标实现了：见到了市长，提出了建议，送上了单车，同时更多的媒体和市民开始密集关注自行

车出行环境，关注自行车出行“路权”。

NGO同行为我们做到这个事情感到鼓舞。而我们更多是对支持这个事情的人们的感激。

“人们”既包括同行，也包括其他市民和政府。在大家的共同协作下，“拜客·广州”和广州市政府两者“双赢”的局面才得以出现。

“双赢”是我们选择的行动方向。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2009年6月份，“拜客·广州”小组成立，成员都是些热心又有行动力的年轻人，来自广州一些公益机构和高校社团。大家以成长和生活所在城市——广州——的环保做主题，以减少机动车行驶、鼓励自行车出行为切入点策划行动。在博客上，“拜

客”们的自我介绍是：一群关注自行车出行环境的朋友，同时也是一群关注社区变化的人，希望通过做点事情，推动市民生活的改善和城市社会的发展。准确来说，我们不全是对自行车的狂热爱好者，但都是城市绿色出行的支持者！

广州自行车面临的情况是：缺乏安全的地方停放；缺乏安全的车道让大家享受骑行的乐趣；道路上空气质量差，。自行车道不见了，自行车停放点越来越少。那么，怎么让这种情况得到改善，怎么来推广我们的想法呢？当时想到，超市人流量大，那里的自行车停放必有市场需求，于是我们对广州百佳超市自行车停放点的数量和规模做了一个小调查，和超市职员、顾客交谈，结果发现，那里根本没有

专门对外的自行车停放点。如何才能为自行车争取一个生存空间？最初我们商量，能否直接去找百佳高层，和他们沟通，建议他们增设自行车停放点，最好有专人保管。因为百佳的客户大多住在附近，如果有自行车停放点，他们更乐于前来购物。

但后来经过深入讨论，我们放弃了这一想法。百佳超市停车用地未必是百佳说了算，其中牵涉到物管和公众用地，关系太复杂，不是我们业余人士短时间内做得来的，也和我们行动“简单、有趣”的要求相反。

在重新寻找行动目标时，体育西地铁站口因为有第一个自行车租赁点倍受我们关注。在一段时间内，“拜客”们集中火力去了解关于这个租赁点的一切想知

道的信息，比如这个是企业行为还是政府行为？使用的是什么人？价钱如何？地点如何？

了解到自行车租赁是政府在推的事情后，我们想，我们可不可以尝试和政府合作呢？我们需要知道政府是否有关于自行车租赁或停放点的详细规划，或者日程表，才能避免重复劳动，更好从市民诉求入手进行意见搜集和反映工作。不过，搜遍了网络，也没见到政府有这方面信息公布。

“拜客”们开始讨论从什么角度切入向政府提议，以营造更适合自行车出行的环境。大家觉得有两点是很重要的：一是有更多的安全的自行车停放点，二是有系统的自行车路网。后一个感觉操作起来难度较大，道路规划铺设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

大家对道路规划又一窍不通，万一拖得时间太长，“拜客”们奔忙于事业和学业，恐怕没那个精力兼顾。过往也有专家提过广州自行车道要形成连续的路网，我们再提就显得啰嗦了。我们想“做一些好玩的、令人有热情、有干劲的事情”。

把目标锁定在更多的安全的自行车停放点，是考虑到简单和可行性高。自行车停放占用的空间不大，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空间配套设施，在闲置地增加一些简单的设施即可。如果增设保管员，还可以增进就业。按照广州目前的自行车安全环境，停放安全了，会有更多人愿意选择自行车短途代步。以此类推，更多人用自行车，更少人用机动车，就会废气更少，空气更好，城市更宜

居。

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设想，但大家都觉得值得一试。要最快见效，给大家一个鼓励，莫过于马上增加一个自行车停车场。既然体育西地铁站口有自行车租赁点，那么可不可以要求租赁点也能停放私人自行车呢？毕竟在推广公共自行车的同时，广州上百万私人自行车还是有找个好“码头”停放的需要。租赁点有专人看管，自行车停放也安全。如果地铁口附近空地是公共空间的话，那么这个公共空间应该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便利的。

点子是这样出来的

确定了要做的事情后，我们开始讨论这个想法是不是符合公众利益，能不能获

得支持，谁能帮到我们实现这个想法，有些什么简单、有趣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实现。于是10月29日，我们在网络上发起了“我要送一辆自行车给广州市长，请你支持我”的投票活动（<http://www.slideshare.net/bikegz/ss-2340837>），以一个年轻人和自行车的饱含情感的图片故事，说出我们心声，也想引起市民们的共鸣，“我送市长一辆自行车，请市长给我一个停车场，希望市长能亲自体验一下在广州骑单车的窘迫，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单车出行环境。”送什么自行车我们也早想好了：一辆老牌子“五羊”自行车。虽然与现在很多造型时尚的自行车相比，“五羊”的款式并不出众，但骑起来十分舒适，其中蕴

含了很多老广州人对自行车的回忆。

为什么会想到送单车给市长？我们想这样更容易引起注意，另外市长平常出入可能都是开车或者乘车为主，很少有机会骑单车，不容易了解骑车一族的现状，同时用单车作为交通工具也符合政府提出的“绿色出行”的理念。希望市长收到这份小礼物后，也能亲自体验在广州骑单车的困难之处。

活动进行得异常顺利。原本我们的目标是征集到一万个支持的投票，但两个月后，仅一个主要的门户网站，“拜客们”的帖子就有高达32000多次点击，近2000条回帖。到2009年12月14日，网络数据显示我们已经有了三万多点击量和两千多票数。于是，我们便准备借

用一市民的建议，向市长信箱递去我们的建议信。

信中首先说明了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次来信是希望能在哥本哈根大会期间，和您会面15分钟，代表和我们有同样愿望的广州市民，亲手将一辆五羊牌单车送给您，以感谢您对推动广州绿色出行所作出的支持和努力。”然后提出我们的想法：“面对广州现时的交通拥挤状况和空气污染情况，我们认为，推动自行车出行是最有效且可行的解决方法。”最后提出我们的建议：“在地铁出入口的自行车租赁点，也可以停放市民自己的单车。希望公共空间不仅用于商业运作，也能够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便利。”

其实在给市长送出这封信之前，我们还有

点挠头，怎么个送法？后来有朋友给出主意，说你们别藏着掖着，就直截了当地给市长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怎么才能送到信。我们照他的话做了，居然很顺利地得到回应。

12月15日，我们以“拜客·广州”的名义，把给张市长的建议信和“我有一辆自行车”的图片故事，连同网友们的评论一起打包投递进了广州市政府的市长信箱。

12月18日深夜11时，收到了张广宁秘书的电话回复：已将意见交相关部门跟进，同时希望“拜客·广州”初定好送自行车给市长的时间和具体的安排。

12月23日，收到广州市交委客管处工作人员电话询问我们的建议，我们提出——希望地铁上盖能预留自行车



新闻1+1的报道

停放点，希望租赁点能停泊私人自行车。

12月30日，经过几次沟通，张广宁回应“拜客们”：交委已经提交了相关方案。

2010年1月10日，市长秘书来电，说市长要见我们了。说实话，当时真有点出乎意料。时间安排在12日下午5点，地点在市政府，建议我们把想说的话拟一个四五分钟的稿子。我们找了一个会议室，花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以

至深夜的时间，七嘴八舌但郑重地把讲稿准备好，一遍一遍地琢磨梳理我们要提的建议。

然后，双方顺利会面。

行动，加上运气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成，我事后归纳有几点，感觉还是有碰小运气的：

一是正当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召开，广州迎亚运工程正热火朝天。

环保和建设两大主题碰在一起，而“拜客”们提出的建议符合当其时大主题；

其次，广州市政府已经在推公共自行车项目，虽然和私人自行车停放关系不大，但双方都倡导绿色出行。市政府可以借此机会宣传公共自行车项目，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提倡私人自行车出行“路权”。

与此同时，市政府的“绿道”规划也一直有在做，并且已经完成部分，市政府可以借此机会宣传休闲、旅游、商业为主功能的“绿道”，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提出统一规划广州市自行车道，让自行车更“生活化”。所谓绿道，是指沿自然和人工走廊建立的，在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和城乡居民聚居区之间起连接作

用的绿色开敞空间，以自行车和步行为主要交通方式。根据广东省的统一部署，珠江三角洲地区将开展区域绿道网络建设，广州市今年内将建成总长约300多公里的绿道网络，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民间与政府的互动，体现出了政府的亲民和务实。而政府当着公众媒体允诺的事情，必有其把握，最有机会由“实现可能性”变“实现必然性”。

虽然我们提出的建议很多直指政府事务不足，但是赠送精心选择的自行车，表达了我们的诚意。一群普通市民，一群关注城市“绿色出行”的年轻人，在“迎亚运，建首善之区”的时间里，以如此温和的方式，送上如此诚意的“礼物”，

市长总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吧。重要的是，这个送礼物附带提建议的方式，“拜客”们都觉得简单、有趣，乐于行动！

人生总是充满意外的。事后媒体采访，不约而同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下一步有什么计划？”无奈事情来得太快，我们还没来得及集中讨论接下来做什么，回答不上。倒是1月16日晚，广州市团市委来电邀请我们这个“无领导小组”加盟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并且可以专门成立一支“拜客”志愿服务队。第二天大家商量后，给出的回应是：“谢谢团市委的盛情邀请，不过拜客广州暂时仍然希望以独立的民间团体形式存在，这也和张市长希望多些民间团队和政府互动的愿望符合。”

不过在我们把这意见反馈过去的前十分钟，团市委已经宣布成立“拜客”志愿服务队，并邀请媒体报道此事——三千“拜客”投入亚运志愿者“大帐”。虽然此“拜客”非彼“拜客”，但我们在官方博客上表示：欢迎“拜客”志愿服务队的出现，希望双方在自主和合作中推动广州的自行车出行……拜客·广州和拜客不是几个人，也不仅是一个小组，我们更希望是一种精神！

（作者龙镇为拜客·广州小组成员）

附

与张广宁市长会面讲话稿

尊敬的张广宁市长、尊敬的各位领导：

下午好！

谢谢张市长和在座各位领导的支持，在繁重的政务工作中抽身出来，促成我们这次见面，我们很感动！也借此机会谢谢一直支持我们的广州市民和拜客朋友！

我们是“拜客·广州”小组成员，一群20来岁的青年义工，一群来自不同行业、在广州居住、热爱广州、热爱生活、热爱骑自行车的市民。今天我们能够“以车会友”，说明了政府对广州自行车出行的支持，和实现广州城市面貌和居住环境“大变”的决心。

“拜客·广州”小组是在09年6月份组建的（“拜客”来源于“自行车”的英文Bike）。我们在广州生活，切身感受到广州机动车交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自行车可以活动的空间却越来越小了。不少同学和朋友聊天会说起，在广州骑自行车很危险，因为没什么地方有自行车道；停自行车也很危险，因为没什么地方保管，丢失的可能性很高，我们在一些公共场合如超市和地铁口及网络与市民交流也有同样心声。

出于对环保和交通的关注和对自行车的热爱，我们自发组织了“拜客·广州”行动，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为市民自行车出行创造更好的条件。首先，我们希望在广州的地铁出入口（包括现行的自行车租赁点），设置可以停放市民自己单车的地方。希望公共空间能够最大程度为市民提供便利。

我们从多个渠道得知，政府在绿色出行方面，正在大力推进。比如在广州陆续增加了一些自行车停放点和租赁点，在修建BRT同时修建配套的自行车道，这些让我们眼前一亮。前几天，我们了解到地铁坑口站的自行车停放点尝试结合了租赁和保管两个功能，做了一个样板工程，我们很开心，还有两位义工专程过去过了一把瘾！

我们相信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自行车出行的情况会有越来越大的改善，从而让更多市民受惠。

借这次见面机会，我们向市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一、在有自行车租赁点同时设置私人自行车保管站；

二、公共单车可以成为免费的市民服务。我们建议在亚运期间尝试实行免费的公共单车服务。我们的成员在武汉出差时了解到，租赁点提供公共自行车免费服务，商家通过在自行车和服务站投放广告获得收益，同时也提供近两千名下岗工人就业岗位，广受当地市民欢迎；

三、自行车服务点提供大学生志愿者实习岗位，也是对“首善之区”一个很好宣传。我们一位杭州的同学表示，曾参加西湖租赁点大学生志愿者志愿服务。而身边不少大学生朋友也表示想多接触社会公益活动；

四、市政府统一规划广州市自行车道；

五、希望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分析自行车出行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对缓解机动车出行压力的效用，同时作为广州市大力推行绿色亚运的一种宣传；

六、提议在运营方面引入多家公司运行，通过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有关部门制订行业规范。并通过多种途径对自行车服务点进行有效的监督。

以上是我们对政府的六个建议，我们也很乐意继续贡献自己，比如反馈市民意见、组织志愿者活动等。

最后，我们想说，五羊代表了广州。今天，我们代表和我们有同样愿望的广州市民，亲手将这辆五羊牌单车送给张市长，以感谢张市长及各位领导对推动广州绿色出行所作出的支持和努力。以及表达我们作为市民的愿望和建议。也欢迎张市长加入我们拜客一族，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广州“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城更美”继续努力！

拜客·广州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二日



拜客广州的宣传画

今天，我的公民行动

文 / 田奇庄

2010年1月25日，星期一。

今天上午是邯郸市第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报到日，也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天，我需要和众多市人大代表见面。

此前，邯郸市先后调整了自来水价格，召开了煤气调价听证会，公众对这种涨价十分不满，又无可奈何。

我作为旁听者，出席了煤气调价听证会。事后，我到物价局查阅了相关资料，终于搞清楚了涨价企业与物价局、听证会的关系，发现了其中的弊端（附文）。

我向物价局提出了质疑，但他们置之不理。我向一些人大代表提出改革涨价方式建

议，也没有得到回应。于是我决定发动公民签名，以公众的名义促使人大代表将此事作为议案，提交人大会议，通过人大程序解决这一问题。

我写出了《改革公用企业涨价听证会的意见书》，经过一个多月努力，争取到了八百多人的签名支持。

今天，我带着公民签名的意见书，来到丛台区会议报到地点——招商大厦，来到会务组。会务组的人让我把意见书留下，说他们会转交给人大代表。

我说，为了写这份意见书我耗费了很大精力，为了引起代表们的重视我发动了八百多人签名。为了对委托我的



公民负责，我需要见到尽可能多的人大代表，把我的意思向他们当面讲清楚。

十点左右，我先后见到了丛台区人大主任张继臣，市人大代表王建平、王国斌、魏国庆等，他们都是我的老熟人，我把材料当面交给他们，委托他们联合其它代表形成议案。

丛台区代表团准备召开代表预备会。得知

情况后，我抓紧赶到九楼会议室。乘尚未开会之机，把剩下的三份材料交给了耿兆仲等三位代表，请他们把大家的意见书反映上去，为广大消费者主持公道。

我知道，八百多人的签名对于人大代表是个压力，我希望这种压力能变成动力，使这个长期以来困扰百姓的事情得到推动或解决。

当然，递交意见书

不等于完成任务。我还打算向市法制办、市监察局、市政府办公厅和主管副市长继续反映问题。

我不知道自己的努

力会有什么结果，但我想，这是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我更清楚，如果自己不对与自己相关的公共利益负责，别人更不可能负责。

附

公用企业为什么总能成功涨价

作者 田奇庄

近期，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水、煤气、电等公用企业纷纷涨价。这已经成了例行公事，行业垄断企业只要想涨价总能达到目的。

名义上，这类企业涨价要由物价部门召开听证会，待听证会通过后才能实施。其实，所谓听证会早已成了涨价会，而企业涨价的实质过程早在开会之前就完成了。

企业申请涨价，必定会列出巨额亏损数据以及造成亏损的理由。但是，能不能认定这些数据和理由还需要旁证。

提供权威旁证的不是别人，正是物价局所属的《价格认证中心》。这是个很奇怪的组织，它提供的是商业服务——认证要收费，可是他的上级却是物价局。想必其收费不会按行政事业收费上缴国库，多半会入了物价局的小金库。

也就是说，公用企业每次涨价都包含了物价局与涨价企业的商业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说，恐

怕最希望公用企业涨价的就是物价局。因为，只有企业提出涨价，他们才有额外收入。《价格认证中心》这条绳子把物价局与申请涨价的企业拴到了一起——作为利益共同体，物价局的任务就是帮助企业成功涨价。

《价格认证中心》提供的旁证十分重要。打官司打的是证据，涨价理由能不能成立，是不是充分，就在于《价格认证中心》对企业的成本认证。因为，这份认证报告将成为听证会讨论的重要基础。

用筷子吃饭的人都知道，公用企业都存在同样的弊端——冗员太多，效率低下，管理费用高，浪费严重。如今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当不上公务员的人，为挤进公用企业不惜血本，几乎所有公用企业都是人满为患。需要五百人干的工作，挤进来了八百人。大家的工资要持续增长，福利要日益增加，脏活、重活都要雇临时工干，企业成本能不高？亏损能不严重吗？

可是，在《价格认证中心》的报告中，却看不到这方面情况的只言片语。只要稍微留点心就不难发现，《价格认证中心》的认证报告往往与企业涨价申请书中的数据惊人地一致。

有比较才有鉴别。按道理来说，《价格认证中心》既然提供成本认证报告，就应当提供全省、全国的同类企业先进经济技术指标，以便将来参加听证会的代表作出比较。从而对涨价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分析企业是否存在经营、管理、决策、效率等诸方面问题。进而探讨

能不能通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加快企业改革，内部消化涨价因素。

可是，《价格认证中心》能为公众提供这样的报告吗？

接下来物价局就要为涨价企业组织听证会。听证会能不能顺利通过涨价，关键要看什么人来开会？

按照有关规定，挑选出席会议代表是消费者协会的事。一般来说，公用企业涨价关系到城市每个家庭，每个消费者都有权参加。消费者协会应通过媒体向全市发布召开听证会消息，从报名者中随机选人参加。

但是，如果那样一来，涨价的事情十有八九通不过，起码很难通过。因为，百人百性，百人百心，要达成一纸公平公正的协议谈何容易。

所以，但凡这类开会信息，有关方面都不会向社会公开，能在少人问津的官办网站公布几天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实际上，能参加听证会的代表都是消协与物价局相关机构协商认可的，其中不乏涨价企业推举的代表。不知根知底的人休想混进来，即使侥幸参加，也不会给发言机会。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有了如此扎实细致的准备，又不被媒体、公众监督，事情还有不成的道理吗？所以，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听证会都开成了涨价会。

不过，操纵涨价者都是人精，谁也不愿意公然成为众矢之的，他们一定会把这台假戏演得非常逼真：企业申请涨价要先报上高价，听证会上，《价

格认证中心》要把企业亏损说得非常严重。“被批准”的与会代表对自己的角色心领神会，其发言一定遵循这样的模式：同意涨价，但考虑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不要涨得太多。物价局在批准涨价文件时，则会把企业申请价格砍掉一小部分——至于降多少，恐怕早在企业打申请报告时，双方就有了默契——后来的一切都是演戏。

多年来，这些戏之所以屡屡成功上演，就在于理应成为主角的出资人——广大市民成了无足轻重的看客。由于这类价格上涨对生活影响不算大，尽管大家知道有些涨价不合理，对听证会的做法不满意，但是经验告诉他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因而大都选择了逆来顺受，沉默不语。

贪官与奸商是天然的同盟军，奸商发财的最便捷方式就是收买官员，官员发财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出卖权力，因此，他们最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联手对付民众。事实证明，正是百姓的沉默与缺位，才造成了权钱交易的泛滥——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官员。

党的十七大，已经决定提高公民意识，把实现公平公正作为执政的重要任务。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没有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根本不可能实现公平公正。如果大家都甘当沉默的羔羊，对贪官奸商联手愚弄公众的行为听之任之，一轮又一轮涨价还会不请自来，不期而至。

“中国模式”谁敢接收

文 / 丁学良

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做发展研究的，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在过去这些年里，常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所谓“中国模式”，当然主要是指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种发展路径。

但是，你就是很难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为什么？

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我暂不提人权怎样，单讲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就够了；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我现在还不提更高的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是再提上就

更麻烦了。仅仅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任何要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学者，都绕不过这道门槛——它们所代表的社会成本是那么的巨大。

第一，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有几个能像中国那样，这么多年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下，不让所有的相对弱势民众——在这样那样的事件中遭遇不公正对待的工人、农民、小商贩、业主、污染受害者、豆腐渣校舍倒塌的受害者、消费者等等——有依法组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农会、协会等团体，进行集体谈判、讨回公道的常规渠道？国际上几十

时还会使用重度暴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二三十年来，全世界有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里，还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市场化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如北朝鲜），不允许自我组织的劳方和资方进行谈判。只有中国很特殊，会对这些全面管制到如此程度。几年前参加一个研讨会，国内学者提到一个实例，我最初还以为是黑色幽默，后来问了好几个人，证实是真的，而且别的地方也常有。说是在大连，一家外资企业里的工人要求加点工资，经过谈判，外方老板基本上对工人的合理要求让步了，可是地方政府竟然叫来警察，把中方谈判代表抓了起来。无论从法律还是人道角度看，抓人都是荒唐的，因为

年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证实，如果劳工不能集体同雇主谈判，无法就其工作条件、工资福利等方面的要求讨价还价，就会处于一个异常脆弱、不堪一击的地位。当劳工和雇主间出现严重的力量不对称时，政府的作为就变得非常关键。

一般来讲，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即使政府不主动帮劳方与雇方进行谈判，如果工人自己组织起来，找到途径——不管工人的组织叫什么，工会也好，行会也好，或者同乡会也好——那些地方政府至少不能每次都去叫警察把工人抓起来，立刻强迫他们的组织解散。但在中国，这基本上是常规现象，地方政府马上就会叫来保安、警察、甚至武警采取行动，有

工人不是用暴力、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去交涉。

在中国模式的发展中，工人还不是最弱势的，对农民更不公正。农民失地得不到适当补偿；农村孩子考大学分数线比大城市的高；最苦最累的活大半是农民工做，而他们并不享有基本的公民权（比如，奥运会设施建成了，奥运前把他们赶走）。顺口溜中国的“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两极大分化”，描述的就是这种状况。

第二，中国高速发展的巨大生态代价。这一点，从国际上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发表出来的指标都有证明。中国的环境问题之严重，在以前，大部分中国人还没

有鲜明的对照机会。这次北京奥运，就强烈对比出来了：北京没搬家，北京周围的省市没搬家，中国北方的邻国也没搬家，但在奥运期间，北京的空气及整个环境是那么不同。这就说明，人为的环境破坏的程度，是何等严峻。

中国的生态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全国水资源被污染。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媒体都讲，原因主要归于中国人均水资源奇缺。德国的一个华人工程师查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水资源人均 2220 立方米。这和德国的水平相当，它是 2170 立方米，但所有去过德国的人都能看到，德国的环境多么好！仅从人均水资源不充足来解释中国绝大部分河流被污染是说不通的。南韩的人均水资源

比中国的少多了，只有 1480 立方米，但是我去过两次，看到的都是青山绿水。所以中国模式中，高速发展的又一个巨大代价是生态的恶化，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

第三，中国模式的巨额行政成本。做公共管理研究的都知道，为了贯彻“GDP增长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的发展政策，中国的各级行政系统常常是不计成本的。县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县”去做；省市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省举市”动员落实；国家级领导层定下一个大目标，那当然就是“举国”动员落实。只要一“举”，其它的统统让路，代价超常难以计算。

中国3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羡慕。但是，对中国模式的分析一旦进入第二个层次，说清楚这些成果是以怎样的综合社会代价取得的，就不好推广了。你能向别的国家明白地说“你要达到这种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吗？中国的无权农民工、黑窑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

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

推广一个模式不仅要讲其效果，更关键的是要讲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方法产出这样的效果的，不然别人无法操作。这就是欲推广“中国模式”的悖论，你仅仅看效果，确实非常显著，但你一讲成本，就吓死人了。

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模式”的惊人效果和惊人代价，做了绝妙的展示。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把奥运办到这样宏大的规模？但不能忘了宏大后面的代价：中国正式公布的花费是448亿美元，这已经是雅典2004奥运会的4倍，是悉尼2000奥运会的5倍多，而这个天文数字并不包括“举国动员、党政军工青妇、各行各业都让

路”的成本。比如，仅仅为了奥运开幕式上的鼓手队，就专门征招了一次兵，两年里全职操练。全世界愿意花这么大代价办奥运的政府不少，但钱不够；全世界有财力这么办奥运的国家很多，但不愿意，因为他们认为还有更值得花钱的领域。

所以，目击了宏大北京奥运会的伦敦市市长说，2012年他们的奥运会预算在93亿英镑（174亿美元）以内，因为民主制和法治不允许办奥运不计成本，尽管英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弱：2007年它的GDP总值2.730万亿美元，是中国的83.2%；人均GDP是45300美元，是中国的18.4倍。

回顾和反思中国30年来走过的路，我们既

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目前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大讲“科学发展观”，只有把这两个“巨大”都实事求是地放进去，才可能在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创建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以不太长的时间，将前述的三大成本持续的降下来。若是，才会使中国的发展不但成为可持续的，也是人道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了。

（转自 FT中文网）



NGO搅动着哥本哈根

文/窦丽丽

从哥本哈根回来后，很多人问我：“感觉怎么样？”或者问我：“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吗？”等等。这些问题经常把我问懵，不知道从何说起。而且，在我和没有去哥本哈根却关注哥本哈根会议、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朋友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知道的信息比我知道的还多，了解得比我还全面！也就是说，在我马不停蹄地在会场内穿梭，在大雪中站在贝拉中心外想尽各种办法试图进场的时候，后方的同志们正在轻点鼠标，浏览着从各种渠道传递出来的各方面的信息。难怪我的朋友颇为得意地跟我说：“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去不

去哥本哈根都是一样的。”

当然，实际上还是很不一样的。在现场，你摸到的可能只是大象的鼻子或者尾巴，但是你真真切切地摸到了，那冲击就比远远地看到整只大象还要更强烈一些。

老实讲，作为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时间不长，又是第一次参与气候谈判的新人，进入贝拉中心的第一天，我就被农贸市场一般的现场打击得晕头转向，时至今日，似乎还没有彻底回过神来。谈判期间所经历的各种场景，来自各个方面的各种虚虚实实的信息，以及各个国家、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我的脑子里不停

地碰撞。

有人说，哥本哈根会议是气候谈判史上最为特殊的一次会议，不公开、不透明，而且第一次对NGO群体的入场进行了限制，在程序上表现极为恶劣（作为受限制人群中的一员，我对此说强烈赞同）。因为其不公开不透明的程序，我们在跟进谈判进展方面步履维艰。出于对秘书处对待NGO的恶劣行径的愤怒，会议后半段，我带着一点起哄架秧子的心态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去关注NGO的抗争。回来以后我发现，可能只有当时在现场的人才会关注和在意这个。

希望这种情况只是个例外。

一直以来，NGO都是气候谈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在谈判期间的表现以及对谈判的影响

也备受关注。

哥本哈根的NGO

在哥本哈根，NGO是最活跃的一个群体。贝拉中心门口，每天从早到晚都有NGO在寒冷的天气中做各种活动：主张“素食救地球”的人们天天在门口发放自己的宣传材料，一本十分厚、十分重、比画册还精美好多倍的书（大家纷纷猜测，他们那些材料肯定得需要一架专机才能运过来），还有免费的素三明治；有人在门口通过喊口号、举横幅、甚至敲锣打鼓等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向各国谈判代表施压。一进会场，首先呈现的就是展览区，主要是NGO展台，也包括一些政府的展台。每个展台上都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宣传品，介绍各机



构的气候相关项目；到处都是穿着“工作服”的人在发放各种各样的“物件”，包括活动预告、围巾、T-恤等；时不时就能听到人声鼎沸，那一定是有机机构在通过行为艺术、民族文化等方式在表达某种立场或者诉求，掌声夹杂着人们呼应的喊声，此起彼伏。

每天晚上，CAN INTERNATIONAL（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网络）都会以娱乐的方式给当天

表现最糟糕、最雷人的国家颁发化石奖，他们会请获奖国家的人来扮演该国政府代表上台领奖，并像模像样地发表获奖感言。这个颁奖仪式每天都会吸引大批人，小小的一块地方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只有一次挤到了里边，那天我正对日本、欧盟和加拿大的表现愤懑不已，挤进去就看见一位日本姑娘穿着和服正“喜滋滋”地代表日本在领奖，于是我也喜滋

滋地观望了一番，满意离开。

在哥本哈根期间，多家民间组织还一起协调了一场大游行。关于参与游行的人数，说法不一，我所听到的是42000人。NGO们在游行中的表现十分打眼，他们打出了各种新鲜的口号，比如：猪是气候变化第一杀手（素食主义团体），澳大利亚是气候变化第一杀手，气候变化是男人和暴力造成的（女权主义团体）……在这场大游行以后，会议的第二周，各种中等游行、小游行、静坐、示威，天天不间断。

总之，气候谈判期间的NGO们是紧张而忙碌的，他们（或者说我们）无处不在。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里也少不了NGO的身影，不管那会是白天开还是夜里开。

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是CAN INTERNATIONAL的例会时间，很多NGO在这个时刻聚集，将各个会议上的信息进行梳理和汇总，并且根据各国谈判代表在这些会议上的表现提名并投票表决产生化石奖。有很多NGO会通过CAN-TALK邮件组将自己所参加会议上了解到的重要信息进行分享，很多人加入讨论。谈判期间，我每天能收到三四百封来自CAN-TALK的邮件，能够切身地感受到NGO对于谈判进展的专注与关切。

我的成功与失败

我是作为CCAN（中国民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小组成员去哥本哈根的，我们小组共有八个人，分别来自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

四川绿色江河、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伯尔基金会、CYCAN（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网络）等，在此次由中国民间机构组织的各种团队中，我们这个绝对是小团队。这个小团队中，有一半是第一次参加气候谈判，另外一半也算不上资深人士。

CCAN组织大家去哥本哈根，更多的是出于能力建设的目的，希望以此来加深大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以后可以更好地开展相关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CCAN团队的目标完全实现了。两个星期心无旁骛地跟进谈判进展，集中轰炸气候变化各个方面的知识，了解各个国家的立场、各个NGO的立场，对于气候问题的认识绝对有了很大突破。

当然，除了能力建

设外，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宣传一下自己，所以每个人都带了一些和气候变化有关的项目宣传资料。毕竟，气候谈判场对NGO来讲，是个巨大的展示、交流平台。事实上，很多NGO参与气候谈判，更多的是出于交流、展示的目的，甚至还有一些NGO是希望能借此机会寻找点儿资源。我们小组的一位同仁，就经常碰到广大的亚非拉兄弟前来询问：“到哪儿去找商人们？”

当然，上面这些，我最开始没想明白，所以，实际上，我是带着无比天真的念头到哥本哈根去的。我带着600份《2009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并希望用这600份小折页来影响谈判。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为此还在心里制定了一份行动

步骤：第一周拿一些立场放在展台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展台、绿色和平的展台、乐施会的展台以及秘书处为没有独立展台的观察员机构准备的展架），让大家自由取阅；第二周，等谈判日趋紧张，高层们纷纷到场，我就站在场内发放立场给大家。这个计划只实现了第一步，此外，CCAN小组出面在CAN INTERNATIONAL的会议上对《立场》作了简单介绍。

总体上，宣传效果差强人意。这其中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第二周风云突变，NGO基本进不了会场了，热闹的贝拉中心少了NGO一下子冷清起来，我自己也有两天时间没有进去，其他的两天也为了进场而绞尽脑汁，为了有机会跟进谈判进展而竭尽全力，等等，这些都导致

我失去了宣传《立场》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不过我承认，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对立场的坚持不是那么底气十足。

NGO的影响力

有媒体朋友问我：

“你觉得中国NGO在哥本哈根表现如何？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谈判？”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稍微改一改，把“中国”两个字去掉。

事实上，从我进入贝拉中心的第一天，看着会场内忙碌的NGO们，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NGO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谈判？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

要影响谈判，必须要通过影响各国政府代

代表团来实现。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NGO和各国政府代表团之间的直接交流不算多。这种状况并不是只有中国NGO才面对的。那么NGO是如何来影响代表团的呢？我觉得主要就是通过那些场内和场外的、各种形式的诉求表达来影响。

如果做一下总结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谈判边缘活动”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包括：提高媒体报道的兴

趣，增加机构的曝光率，并通过媒体报道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度；给沉闷严肃的气候谈判增加趣味性。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谈判，实在很难讲，或者说谈不上。因为关注这些活动的也多是NGO自身，还有媒体，基本没有政府代表团成员。真正的目标人群不关注，那影响怎么能实现呢？有的机构还会通过“给奥巴马写信”等方式来



表达诉求，但是其效果也很难评估。或者可以这么说，从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倒推一下的话，NGO的诉求基本上被完全忽视了。

再说一下宣传品的有效性，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有位朋友的MSN签名改成了“哥本哈根，真正的文山会海”，描述十分准确。会海不用说了，大会小会全会边会，一天得有上百场。文山呢，各机构带去的宣传材料，项目宣传页、立场文件、研究报告、书籍，堆积如山，数不胜数。有不少人是在领完材料以后看一看就扔掉了，其有效性也很难讲。

当然，这其实不能怪NGO。我十分相信NGO想要影响谈判的一番苦心和好意，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那些我们想要影响的人，他们在多

大程度上愿意采纳我们的意见呢？

我更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凭NGO在两个星期内的表现来评估NGO的影响力，我们不能将NGO在谈判期间的工作和其他时间内的工作割裂开来。NGO的工作是长期性的，在会议前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在会议后也是如此。谈判场，只是对他们长期工作的一个集中展现而已。在谈判期间，他们集中所有力量，不分昼夜工作，只是要在关键时刻奋力一搏，对准爆观点，集中突破。

我相信，从长远的角度来讲，NGO的宣传倡导以及其他项目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种作用是通过多种不同的路径潜移默化实现的，不仅仅是谈判。

抛开前面所讲的种种难以评估效果的活动，我认为，NGO参与气候谈判是十分必要的。将公平、公正作为信仰的NGO对于谈判的公开、透明能起到监督作用，能够传递真实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加以分析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公众。从这个意义上讲，NGO的参与的确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在我们被限制入场以后感受更为强烈。看着会场内人去台空的展台背板上写的“HOW CAN YOU DECIDE ABOUT US WITHOUT US”（没有我们你如何为我们做决定），心里顿时涌起无限的共鸣。

我们如何关注气候变化

参与气候谈判的NGO，大概可以分为两

类：常客和过客。所谓常客，是指长期持续跟进气候谈判的人或机构，很多大型国际NGO属于这一类；而过客，更多是从草根之中产生，他们只是偶尔参与一次谈判。

我大概就属于过客。虽然哥本哈根的热闹激发了我对气候谈判的浓厚兴趣，但是，我知道，在很大程度上，那只能是个人的兴趣，多看文件多交流多学习。想长期持续跟进谈判，难度太高。因为无论是我本人，还是我所在的机构，都承担不起跟进气候谈判的庞大成本。所以，我们只能想方设法从其它更有可操作性的角度切入，来关注气候问题。

一直以来，作为草根NGO的工作人员，在气候问题上，我和我的同事是有些许“自卑”

的。每当媒体来采访，问一些诸如“你们自然之友在气候变化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中国的民间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如何”之类的问题，我们就低头沉思，然后非常诚恳地告诉人家：中国民间组织关注气候变化的时间还比较短，也不够深入，可能很多项目都和气候变化有些关系，但是直接和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不多。气候项目在自然之友也不算重，各方面加起来也就一个整劳力……说的很绕口，我们自己很累，采访的人也很扫兴。在我的固有观念里，只把那些气候政策分析研究、CDM、碳交易之类的项目当作“气候变化项目”，我们所做的“低碳家庭”、“低碳出行”等项目只能算是和气候变化沾点边。

但是，在哥本哈根，我发现，除了一些大型国际NGO以外，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机构和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没有专门研究气候政策，没有专门跟进谈判，他们所展示出来的项目也是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沾点边的非直接相关项目”，比如可再生能源，比如环境教育，比如弱势群体救助，等等。很多此类项目还通过边会等形式进行了详细展示。

再来看看谈判，谈的都是什么？除了减排指标、资金、技术等大框架外，再就是REDD（减少伐林和林地退化造成的碳排放）、LULUCF（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CCS（碳捕捉与封存）等，这些，也都是和其他环境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换个通俗点的说法

也就是：气候变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而如果筐里没有东西，那也就剩个空架子了。所以，我们绝对不可能脱离其他环境问题来谈气候变化，在谈其他环境问题的時候也不能撇开气候变化的背景，很多因素导致了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又使得

其他环境问题显得更加紧迫和严峻。

正视这一点，草根们在气候方面的“自卑”就可以一扫而空了。我们虽然没有花费很多精力去关注那个筐，但是我们已经花了很大精力并将继续花费很大精力去关注往筐里面装的东西。



美国：84%的捐款来自个人

文 / 徐贵

海地发生大地震，成为这几天美国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媒体也有许多关于灾情和救援的特别报道，包括普通美国人为帮助海地灾民所作的捐赠。

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用金钱或物品去帮助他们，这是“慈善”(charity, “爱”)的原意。美国人捐款都是个人行为，不在公司、学校、政府机关中进行，更没有组织动员的。这次为海地捐款的一种很受欢迎的形式是“手机短讯”。只要在手机中打入Haiti(海地)，就表示你愿意捐款10美元(这是捐款上限)，款项会算在下次电话公司寄来的账单中。一个人捐款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他自己不说，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我所居住的奥克兰市也不例外，《奥克兰论坛报》1月16日在头版刊登题为《援助是“道德责任”》的文章，报道了附近一家叫Med Share(医疗分享)的慈善机构往海地送药品的消息。报道题目中用“道德责任”(moral imperative)，就是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人服从自己内心的“道德命令”。

在美国，慈善和公益都用charity这个字，但在意思上还是

个人服从自己内心的同情心，用爱去对待

有些不同。同样捐款，区别在于是否为了救助直接有需要的弱者。在出现灾情时，捐款是一种慈善，平时的捐款则多为公益。例如，前不久，华人张磊为耶鲁大学捐款，就是非救灾性的公益行为。Med Share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收集和分发由医疗产品公司提供的多余医疗物品，具有公益性质，但向世界贫穷国家免费提供这些物品，则是慈善性质的。

美国人有比较好的捐赠传统，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研究中心“美国捐赠基金”有一个报告，说明2006年美国人共捐出善款2,950.2亿美元，比2005年的2,830.5亿美元增长了1%。2006年是美国自然灾害较少的一年，赈

济负担相对也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去除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因素，2006年的捐款实际比2005年增加了3.2%。

根据同一年中华慈善总会公布的材料：在中国每年收到的捐赠大约75%来自中国以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专项调查显示，中国上千万家企业里，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慈善捐赠。目前，中国私人捐赠不足10亿元。对比一下美国同类统计材料，就可以看出两国的差别。

美国捐赠善款的人，并不像许多人想象那样，大部分来自公司财团。75.6%的善款来自个人捐赠者。如果算上

个人去世后向社会捐赠的遗产，那么个人捐赠占全部善款的83.4%。

善款用途很多是公益性的，以2006年为例，32.8%(960.82亿美元)捐给宗教组织；13.9%(400.98亿美元)捐作教育的用途，包括大学、图书馆等。还有许多捐给公共电视、广播和各种与环保、和平、人权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纽约大学慈善研究中心的戈迪亚尼教授(Claire Gaudiani)把捐赠看成是美国国民性的特征。她指出，与世界上第二个最乐善好施的国家英国相比，美国人的捐赠款高出了一倍之多。2006年10月慈善援助基金统计显示，美国人的捐款是美国国民经济总值(GDP)的1.7%，英国人的捐款则为英国国民经济总值的0.73%。

在美国，个人捐款来自各个收入层次的普通公民。在家庭收入1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中，有65%是参与捐赠的。普通公民的捐赠意愿和捐赠行为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一个社会要保护并有效运用这一资源，需要把“捐赠”和“施舍”区分开来。这一区分大致也是“公益”和“慈善”的区别。

作为公益行为的捐赠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不是等到有了灾情才采取的应急措施。普通公民普遍参与公益，有助于从正面确立公益的社会意义和利他道德精神。如果只有少数富豪大笔赠款，许多人会认为捐赠只是有钱人才该做的事情。他们甚至怀疑捐赠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

的，是不是为了公关形象、赎罪或者是纯粹出于省税的利己动机。一味地如此猜疑，只会增长社会中的道德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普通公民越多参与公益，公益才能越加成为公众心目中真正的好事。

普通公民参与公益，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社会风气和公民行为的相互补充关系。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有现成不变的道德价值，人的道德价值是在人群关系中学习和逐渐形成的。这种人群关系包括家庭、交往者、学校、教会、职业联系、特定的社会，等等。如果人群期待和鼓励人们捐赠，把捐赠当作人群成员应尽的责任，形成一种风气，那么这种责任就会因习惯的内化而转变为一种道德价值。

(作者系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记恋真由美

郭宇宽

很久没有看电影了，想让自己放松一下，打开了久违的电视机，中央六套在播放的日本老片儿《追捕》。本来是想随便看一看，因为这是我小时候没有看懂，却印象最深刻的电影之一。恐怕全世界的电影观众包括日本在内，都不会像8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人那样痴迷这部电影。那时候我大概还没上小学，是在还叫南京工学院的东南大学校礼堂里看的，当时的大人们简直都对这个片子迷疯了，似乎茶余饭后都在议论高仓健和真由美。我记得这部片子至少放了很多遍，因为我肯定看了不止一遍，都是我家的大人，比如父母，小姨，姑姑

带我去看的，名义上是他们带我去看电影，可他们自己看得很带劲。而我其实对这部片子没什么兴趣，可能是我当是太小，对剧情都不大理解，当年对真由美这个阿姨印象不深，只对片子里杜丘骑马、开飞机，包括一头狗熊从树林里窜出来的镜头记忆比较深刻。

我这次再看《追捕》的时候，一看就入戏了，注意到片子里杜丘和真由美居然还有那么唯美的接吻镜头，好像我记忆中从来没有看到过，尽管我陪大人看过这个片子很多遍，大概是我小时候每到这个地方都看得睡着了。

在“啦呀啦”的激动人心的旋律中，在

一望无垠的北海道的原野上，在东京警视厅警探的围追堵截下，真由美与杜丘相拥在马上驰骋，真由美波浪般的长发飘扬，可以媲美任何洗发精广告里的模特。杜丘急切地问：“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镜头推进，真优美脸上绽放陶醉的羞涩的笑：“我喜欢你！”那时候好像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强大力量让我的心震动了。第二次真由美骑马出现，是杜丘在东京新宿遭到警视厅的围堵，她一袭黑衣，明亮的眼神沉着冷静，救出早已慌不择路的杜丘，当她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驱赶马群，简直不可思议地冲破警视厅防暴盾牌的丛林，留下飒爽英姿的背影。在电视机前，我几乎忘记了这是电影，忘记了用逻辑来思考情

节安排是否经得起逻辑推敲，眼泪在眼窝里直打转。

以爱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一向不是我的阅读经历中最打动我的，而为什么这部电影，要在一个孤寂的百无聊赖的冬夜把我击穿。而且奇怪的是，记得在所有过去的影评和讨论中，高仓健都是焦点，用现在的话来说，高仓健是个纯爷们儿，对应的是中国荧幕一度时髦的“奶油小生”。而在我看来和真由美的出色相比，影片中杜丘的饰演者高仓健完全就是个配角儿，潜意识里也许还有某种男人天性中的嫉妒，我一点儿不觉得高仓健能称得上帅，反而越看他那个呈鞋拔子状的苦瓜脸越觉得有些像赵本山，简直配不上真由美。

今天很晚了，我还

睡不着，真由美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一定要我找到了一个原因，我想应该是中野良子塑造的真由美身上的一种气质打动了我内心最深处地方，那种气质是叛逆和忠诚的统一。这种叛逆是超越身份地位和世俗的所有界限，明知一个人被当做逃犯，也看到他身上的美德，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忠诚是即便这个人是全世界的敌人，也根据自己的判断，相信他是一个好人，愿意为了他挺身而出，甚至不怕站在整个警察系统，乃至整个体制的对立面。

《追捕》中的真由美因为和杜丘的意外交往爱上了他，她相信杜丘是好人，他是被冤枉的。甚至杜丘自己都缺乏自信的时候，真由美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如果你是罪犯，我就是你的同谋！”不得不承认，这句话有超越了儿女之情而让我感到折服的惊心动魄的魅力。这哪里是言情，这分明是个人理性和道德勇气的宣言。

联想到《追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被引进大陆的第一批译制片，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中国进入了一个较为宽松，宽容的政治环境，人们开始憧憬健康的生活，而文革的阴影一定在那时的大人们记忆中存在。有多少家庭在横扫一切的暴虐权势下家破人亡，甚至被逼迫站出来揭发自己的恩人、亲人，有生存还是毁灭的考验要求一些人和自己最爱的人划清界限。有多少对这个民族怀着忠诚和热爱的好人，因为对领袖和政策有一点不同

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那些不幸的人们当他被政权和整个社会抛弃的时候，被要求不断地检讨、求饶，把有思想的人变成横路敬二一样的痴呆，甚至肉体消灭。有几个人？在他绝望的时候，有他的亲人哪怕在他耳边悄悄地告诉他“如果你是反革命，我就是你的同谋！”极权体制最邪恶之处，就是要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把权力像章鱼一样的触角伸入人与人之间哪怕最隐秘的情感角落。甚至一个国家主席被更高的权力打倒，都不允许有人为他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更不要说吊哭叛逆，那样的社会被抹去了最后一丝人性的光彩。

也许《追捕》只是一部童话，但我多么希望真由美的气质在我们

的历史中，甚至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能够存在。好人杜丘所面临的追捕并不只在电影中存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景像何尝不就在我们身边发生，有黑暗中的力量阻止人民接触到真相，要置义人于死地，把赤子诬蔑为罪人。

从我懵懂记事起到现在经过了20多年，我才终于读懂了《追捕》，读懂了真由美，也读懂了人性之美。当你所认识的人，你知道他是好人，却被人陷害、冤枉，被整个社会误解，你愿意告诉他“假使你被整个社会抛弃，我也站在你的一边。”即使有千万人的喧嚣，依然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头脑，相信什么样的人是好人的，什么样的人值得尊敬和爱。

把社会新闻大声读出来

“我通过一个单词，就把外国的网站搜出来了。我一方面为找到它们而激动，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聪明而激动。我高度紧张地看了几分钟，就关掉了。也就是那几分钟，将一个原本洁白的心灵，迅速染黄了！（大声地）……”这是一对夫妻在朗读山西晚报的一篇社会新闻《记者对话举报色情网获奖小伙：

曾沉迷色情网站》，引得满场止不住的笑声。写得一本正经的新闻一旦被大声地读出来，突然变得好象戏剧。

那是京城媒体人士王小山1月17日组织的一场社会新闻朗读会，虽然他说，那只是为了玩儿，光怪陆离的社会新闻，通过朗读者一本正经的诵读，却能让人看到更为真实的社会。在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



社会新闻

间里，约十四五名读者朗读了首届同性恋选美比赛被暂停、谷歌退出中国市场、老婆痴迷开心网老公怒砸电脑等五

花八门的各类新闻。

详细内容请看
<http://home.ngocn.org/space-28818-do-blog-id-7432.html>

律师学者建言：公办幼儿园应平等接收新市民儿童

1月26日上午，北京公益律师李方平和学者胡星斗向北京市人大递交公民提案，呼吁人大关注20多万北京新市民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他们建议，加大对新市民儿童学前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并要求北京市政府推动落实现有的公办幼儿园向新市民儿童逐步开放，新建公办幼儿园全面、平等开放，保障北京新市民儿童平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

李方平是在北京执业多年的北京新市民，

近年来一直在关注北京市非户籍人口的生存状况和受教育状况，关注北京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北京理工大学教



代课教师

授胡星斗曾多次就北京市非户籍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致信北京市相关部门。针对近两年来各界反应强烈的儿童入园问题，李方平和胡星斗在研究北京市政府和各区政府增加公办幼儿园数量的规划时发现，这些规划没有对新市民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予以充分的考虑。

据北京晚报报道，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175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509.2万人，占常

住人口的比重为29%，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北京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京市近三年出生的46万幼儿中，户籍人口占49%，非户籍人口占51%。而根据前述北京市政协的调查，目前在园的22.7万儿童中，户籍儿童为17.4万，非户籍儿童仅有5.3万。由于公办幼儿园资源有限，大部分公办园在招生时设置了户籍限制，新市民儿童被挡在了公办幼儿园门外。

香港有个投诉合唱团

如果一个人总是抱怨，哪怕他说的都是对的，也难免令人厌烦，可是，如果这种抱怨是用歌唱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呢？在香港，有一群年轻人组成“投诉合唱团”，常常结队在城市的各种场合出现，手上拿着歌词，唱着简单上口的曲调，表达着平常市民的抱怨和心声，用一种好玩的complain方

式，希望make a change! 投诉合唱团的概念来自芬兰艺术家Tellero Kalleinen 及Oliver Kochta-Kalleinen。最初，他们希望将市民抱怨城市的巨大力量转化成另一种强大的力量。芬兰词汇“Valituskuoro”意思是投诉合唱团，用以形容很多人同时投诉的情境，Tellero Kalleinen



投诉合唱团



香港投诉合唱团

及Kochta-Kalleinen便用了这个字面意思成立了真正的“投诉合唱团”。

第一次在伯明翰的演出后，投诉合唱团取得空前成功，因为抱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个计划可以在世界上所有城市举行，自此投诉合唱团便在世界不同的城市演出，包括韩国、新加坡、汉堡、圣彼得堡、墨尔本、芝加哥、

佛罗伦斯等。投诉合唱团聚集了年幼老少、互不相识的人就特定事件或个人经历道出对城市的不满，这种以集体形式对城市进行控诉，不期然地使参与者和听众会心微笑，甚至仰头大笑。

当投诉合唱团作为一件录像作品于不同地方展出(甚至在网上转载)时，它一方面向观众呈现市民对自己城市

最真诚的诉求，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深入的文化交流——透过投诉合唱团活泼的演出形式，我们作为观众，乐意从一句句歌词当中逐步了解该城市的特性并期待改

善。

香港投诉合唱团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OMzU4NDQ4.html

(小燕子)

麻风康复者眼中的世界

1月10日上午，广州市文化公园，“生命之光—麻风康复者摄影展”开幕。这是一次有点不一样的摄影展，那些作品的拍摄者，就是康复者本人。

相当一段时间，麻风病令人类闻之色变。麻风病肆虐时期，所有查出患有这种可怕疾病的人会立即被送到“麻风院”进行隔离。如今，医疗技术极大提升，麻风病已经没什么可怕。但麻风康复者由于过去长期治疗条件的限制，身体有不同的残

疾。因为世俗的歧视，他们依然有家难归，只能滞留在康复治疗所——“麻风村”。多少年来，他们带着残缺的肢体和溃烂的伤口在被社会误解和遗忘的地方默默生存，他们的悲与喜唯有独自品味，持续一生。



麻风康复者

2009年4月汉达社工组织康复者成立摄影小组，为每位组员配备一部数码小相机，鼓励他们以摄影的艺术形式来打开心扉、表达情感。艺术，可以怡情，是自我宣泄与安抚伤痛心灵的最佳行为。

尽管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使用相机，尽管他们手脚不便以至每一次拍摄都要付出许多，但他们以顽强的生命力与过人的悟性，拍下一张张不一般的作品；尽管拍摄的只是他们身边生活的一花一草、一狗一猫、点点滴滴，因为经历的不凡，平凡的景物在他们的“眼界”呈现出不凡，这些映射出他们生活状态的影像与众不同，趣味天成，直觉、感悟造就了他们作品的率直、纯真与非凡。这一张张渗透着康复长者

顽强努力拍得的图象，能让观者感触到他们的心——“图为心画”，这些图象，也折射了他们的心灵渴望。

邀请函

尊敬的嘉宾：
 兹定于2010年1月10日（星期天）早上10点
 于广州文化公园4号展馆举行“生命之光
 ——麻风康复者摄影展”开幕式，诚邀您
 届时莅临指导。

广东省汉达康复协会

时间：2009年1月10-13日
 地点：广州市文化公园康乐园4号
 馆（广州市西堤二马路37号）
 开放时间：正门、北门（上午六时
 至晚上九时半），东门、西门（上
 午六时至下午五时晚上九时半）
 联系电话：（总机）106、110、
 123、81
 （文化公园站）1318、209、238
 、281、31、38、552、57、珠江
 2线、6号

诚邀您参与观赏！

生命之光

“生命之光—麻风康复者摄影展”邀请函

公益购物，爱心无限大



由于PLP (Pass Love Project 爱心传递工程) 加入了Amazon、当当网、卓越网的购物联盟，假如你通过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提供的链接，去以上三个网站购物，它们就能够得到一定得返款，用于资助贫困地区购买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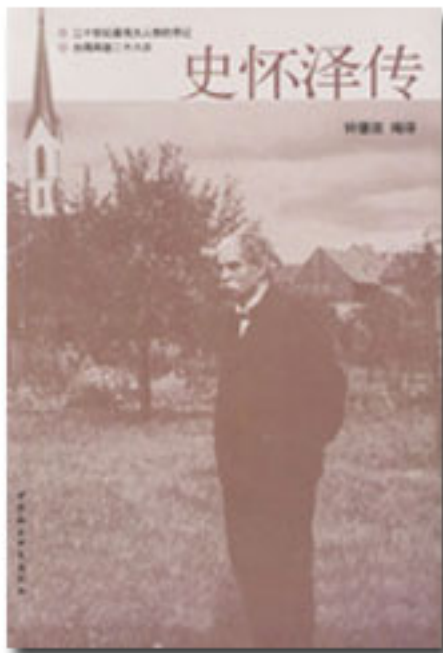
在不影响你购书的情况下，何不参与公益购物？只是多一个点击

而已。PLP的财务都在论坛公开，你可以到论坛查看，再决定是否参与。【到这里获取公益购物链接<http://www.passlove.org/bbs/read.php?tid=1540>】。

@民間



史怀泽是二十世纪人道主义的巨擘，他的名字几乎已成了“人类爱”的代名词，像他这样在生前即普受尊崇，去世后，仍活在人们心中的伟人，举世并不多见。他长达九十年的生命中，充满了可歌可泣令人激动的伟大事迹，在在都可以使我们感动而奋发。本书以生动的笔触介绍了史怀泽博士一生的行迹，从他诞生，一直到非洲行医长达小半世纪之久后溘然长逝的经过。他那种浩然正气，贯彻始终的毅力，无私的爱，在在均值得我们作为一生的榜样。



教育已经是个无数人关注的话题，但这种关注似乎又进入一个黑洞：人人都对现行教育状况喊打，指责，但都呈现出无奈，那么，教育变革的动力和突破到底在哪儿？如果不指望某一天有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我们该做些什么？信孚教育集团的努力也许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本书传主信力建，一位温文尔雅的儒商，新时期以来中国民办教育的先驱，“中国民校第一人”，同时也是被称为“爱心大使”的慈善家，善于独立思辨并自成一派的思想家。本书详述了信力建及其信孚集团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并阐述了其平民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理念，以及作为成功的企业空回馈社会的慈善义举。解，那我就万千感动了。



这是一个台湾青年写给13亿大陆同胞的一封信，讲述30年来的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大的政治变化和社会生活的变迁穿插辉映，这些细节的展示能够让我们看到制度的变迁有何意义，同时也看到很多东西的变化也并不是因为制度的变迁，比如很多社会事物、包括公民社会是如何逐渐一点一点地成熟起来的。作者自述：我成长的这三十年，刚好赶上了台湾社会变动最剧烈的三十年，不管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次文化上，似乎都突然在这些年间整个爆发出来。有些我恭逢其盛，有些我是局外人，冷眼旁观；在这里，我试着将我的成长历程，将这些社会事件结合起来，对于这些社会事件及变迁，我尽量不去做评论，只将它很客观的描写出来。以及解释这些社会变迁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我不敢说我写得这些文字就完全代表了台湾人的想法，但若您看了对台湾稍微产生了那么一些些的理解，那我就万千感动了。



这是一个台湾青年写给13亿大陆同胞的一封信，讲述30年来的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大的政治变化和社会生活的变迁穿插辉映，这些细节的展示能够让我们看到制度的变迁有何意义，同时也看到很多东西的变化也并不是因为制度的变迁，比如很多社会事物、包括公民社会是如何逐渐一点一点地成熟起来的。作者自述：我成长的这三十年，刚好赶上了台湾社会变动最剧烈的三十年，不管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次文化上，似乎都突然在这些年间整个爆发出来。有些我恭逢其盛，有些我是局外人，冷眼旁观；在这里，我试着将我的成长历程，将这些社会事件结合起来，对于这些社会事件及变迁，我尽量不去做评论，只将它很客观的描写出来。以及解释这些社会变迁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我不敢说我写得这些文字就完全代表了台湾人的想法，但若您看了对台湾稍微产生了那么一些些的理解，那我就万千感动了。



@民間

第九期/2010年

在线阅读/下载: atminjian.ngocn.org

博客: zaimianjian.ngocn.org

联系邮箱: zaiminjian@gmail.com